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文房四谱

外十七种

〔宋〕苏易简等著

朱学博 整理校点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文房四谱

外十七种

〔宋〕苏易简等著
朱学博 整理校点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 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房四谱：外十七种 / (宋)苏易简等著；朱学博整理校点.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7

(宋元谱录丛编 / 顾宏义主编)

ISBN 978 - 7 - 5458 - 1081 - 3

I. ①文… II. ①苏… ②朱… III. ①文化用品—研究—中国—
古代 IV. ①K87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228 号

责任编辑 顾 佳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文房四谱(外十七种)

[宋]苏易简 等著

朱学博 整理校点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30,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1081 - 3/K · 186

定 价 30.00 元

总序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①《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玕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

① 朱积孝：《谱录述略》，载《图书馆》1995年第6期。

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①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道《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

① 永瑒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茶经》，中华书局影印本。

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绶《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

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編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碗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荔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未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鸩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

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①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序》。

《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究，故本丛编一仍其旧。

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动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

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 ）”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乙未五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前言

古人把日常书写、绘画所用到的器具，统称为文房用具。本册包含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林洪的《文房图赞》、米芾的《砚史》、陆友的《墨史》等十八种宋元时期文房类谱录。

古代文房用具中，最常见的是笔、墨、纸、砚，被人称为“文房四宝”。毛笔的历史悠久。传说秦代蒙恬造笔，然而建国后在湖南等地的战国墓葬中，出土过战国时期的毛笔，笔头为兔毛制成，和后来人们所见的毛笔形制相似。可见早在战国时期，毛笔就已经广泛使用。制笔的原料除今人常见的羊毫、狼毫外，还有兔毫、獾毫、鼠须等。晋王羲之《笔经》有言：“岭外少兔，以鸡毛作笔，亦妙。”此种鸡毛笔后人仿制，然并不适合作书，不知古时如何。宋人笔记中有载麻毛笔，是纯以麻制成。实际毛笔中多掺麻为芯，否则不挺健。唐笔形制与今不同，一般笔头不长。更有鸡距笔者，乃是唐时名品，笔头粗短如鸡距，白居易专门写过《鸡距笔赋》，其云：“圆而直，始造意于蒙恬；利而铓，终骋能于逸少。始则创因智士，制在良工。辍翰停毫，既象乎翘足就栖之夕；挥芒拂锐，又似乎奋拳引斗之时。”今人作晋唐小楷者，犹仿制此品。宋后笔锋渐长，有称鹤脚、长颈之品，锋长寸许。此外，宋代还有一种“无心散卓笔”。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歙本不出笔，盖出于宣州。

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此属宣笔，不用柱毫，而用一种或两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散毫、虚锋，改变了晋代以前的旧制。其笔笔毫一寸藏于笔杆中，根基牢靠，久用不散，一支可抵他笔数支。其后明清两代虽然制作名目渐多，品类纷繁，然与今无异。

墨亦历史悠久，殷墟出土甲骨中，就有墨书痕迹。传世的先秦简帛上，也都是以墨书写。现出土的古墨实物，最早者有秦代的墨丸，是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湖北云梦。汉代隃糜以产墨著称，《汉官仪》云：“尚书郎起草，月赐隃糜大墨一枚，隃糜小墨一枚。”后来人们遂用“隃糜”作为墨的代称。汉唐以降，制墨业迅速发展，相关典籍著录亦增多。最为著名的是南唐李廷圭（一作庭圭），其所制之墨坚如玉石，光泽如漆，时与澄心堂纸、龙尾砚并称，是南唐和北宋御用之墨。有传说徐铉兄弟读书十年，李廷圭墨一铤尚未磨尽，磨口锋利如刃，可以裁纸。由此廷圭墨备受士大夫青睐，苏轼、米芾等都多方求购，视若拱璧。在北宋宣和年间，廷圭墨便已稀有，号称“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两宋时期，制墨名家高手大量涌现，文献记载也十分丰富，如张遇、潘谷、沈珪等都颇负盛名。《铁围山丛谈》中记载过一个故事：“滕令赟监嘉禾，遗沈珪墨于荷池，二年后浚池复得，坚致如初。”可见沈珪之技术，已被传言得神乎其神了。明清是制墨的鼎盛时期，不但制墨技法繁复多样，还出现了供人观赏把玩的集锦墨、彩色套墨。所谓集锦墨，是按

一类题材制成成套的多种墨块，上绘有各种图案。为明代安徽休宁派墨工所首创，一般以几锭、十几锭为一套。清代有“御园图”集锦墨，多达64锭。集锦墨的形状、图案各具特色，有的如画卷，有的似古钱，有的像琴，有的类钟，有的做成亭台楼阁等。构图巧妙，形式优美，雕工精良。既可实用，又可供观赏。此外，徽州地区的八宝药墨，作为中药也颇有盛名。

先秦书以竹木，即所谓简牍。后有绢帛一类丝织品，汉代出现纸。旧传蔡伦改良造纸之法，以树皮、草麻等为原料，使纸张廉价易得。晋代有用海苔造纸，名曰“侧理纸”。唐代史料中所载纸笺名目花样繁多，做工精美，最负盛名者为薛涛笺。据史料载：“涛好制小诗，惜纸长剩，命匠狭小之，时谓便，因行用。”《牧竖闲谈》载：“薛涛另模新样，小幅松花纸，多用题诗。”宋代笔记中见有以中药入纸，可以防虫防霉。其后造纸记述日新月异，各色品种不可胜数。唐宋以前，佳纸不易得，朝廷屡有赐大臣纸墨的惯例。尤其是不少文官著述，朝廷都有颁赐大量纸笺。东晋干宝作《搜神记》，上表称缺乏纸笔，常用故纸。上答云：“赐纸二百枚。”梁刘孝威《谢官纸启》云：“虽复邺殿凤衔，汉朝鱼网，平淮桃花，中宫穀树。固以惭兹靡滑，谢此鲜光。”由于古代宣州造纸技术最高，品质冠绝天下，故而古纸皆统称宣纸，今安徽宣城泾县犹以此闻名。

砚台旧说起于汉，然湖北云梦出土过战国石砚，尚配有杵棒，因上古制墨之法未备，所用颜料矿石，须杵棒于石砚上研磨。至汉代以后，造砚之法渐趋成熟。除石砚外，尚有以金玉、

木陶、砖瓦等为之。后来传统有四大名砚之说，是指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然唐人尚不重端砚，李贺曾有诗记端砚，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然而并未推为天下第一。柳公权评天下名砚，以青州石末砚为第一。至宋代端砚名声日盛，士大夫追捧不已，以至于出现了《端溪砚谱》这样的专著。然而由于端砚的名贵，宋代端州便为贡砚所累，加上市场需求不断，一直大量开采。包拯知端州，以州民不堪其苦，下令仅取贡数，离任不持一砚。苏轼曾目睹端州采石之景，云：“千夫挽纆，百夫运斤。”

徽州歙砚，唐末即是贡品，南唐后主李煜视歙砚为“天下之冠”，于歙州设砚务官，专门搜集佳石进贡宫廷造砚，歙砚身价扶摇直上。所谓与李廷珪墨、澄心堂纸并称的龙尾砚，即是歙砚。南唐败亡后，歙石停产数十年。北宋中受士大夫追捧，渐又兴旺。米芾、欧阳修、苏轼等士大夫颇为青睐。欧阳修在《砚谱》中赞誉歙砚，其云：“龙尾远出端溪上。”认为歙砚胜过端砚。据文献记载，歙砚有罗纹、眉子、金星、金晕、鱼子等五十余类。罗纹有粗、细、暗细、水波、松皮等，尤以暗细罗纹最难得；眉纹有阔、细、长、短、对、鳝肚、雁湖等，尤以雁湖眉纹最罕见。宋代还出现了《歙州砚谱》、《歙砚说》等有关歙砚专著。

此类名砚砚坑大多宋代就已开发殆尽，至明代一度诏令封坑，后多重开新坑，清代亦如是。所以宋坑名砚流传至今者，如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除了笔、墨、纸、砚之外，古人的文房用品还有很多，如笔架、笔洗、镇纸等等。宋代林洪在其《文房图赞》中，就列举了十八种文房用品，各以拟人的手法，封授官职。如将毛笔称作“毛中书”、砚台称作“石端明”等等，颇有趣味。如他把墨称作“燕正言”，下附赞语云：“其惟燕氏，既刚且和，而清而丽。置于王所，与黯何异。有所不言，言必正矣。彼黄与朱，寔同厥徒。简在上心，虽鲜用诸。”在拟人游戏的同时，托物言志，通过赞语抒发怀抱。元代罗先登作《续文房图赞》，又在林洪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品种。诸如围棋、盆景、屏风等，都列入了文房器物的范畴。这说明随着文人墨客的审美不断发展，文房用品也不断增加、变化。不少用具从最开始的实用器物，发展为日常把玩的欣赏器物。这些器物很多不但工艺精妙，而且还极富有文人气息，文化内涵，专供案头赏玩，便又有了“文房清供”的雅称。

宋代文房用具的种类十分丰富，由于文人雅士的喜爱，对这类器物的研究著作也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宋人撰写了许多谱录。或画影图形，辨析品类；或引古论今，考证源流。目前存世的宋代谱录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是北宋苏易简的《文房四谱》，其书不仅介绍了有关笔、墨、纸、砚四种用具的历史文化、掌故趣闻，还有对品种、制作等内容的记载。作者还大量搜集了相关的诗词歌赋，附于谱中。既有知识趣味性，又有文学性，更有一定的文献史料价值。由于苏易简搜罗广、议论精，这本书在北宋时就名气很大，后来诸家撰写文房类的著作，

没有不提及、引用此书的。

随着宋代谱录的发展，文人学者对文房器物的研究加深，相关的谱录也随之细化发展。在苏易简之后，宋人出现了许多专门性的文房类谱录。如砚谱一类，有《端溪砚谱》、《歙州砚谱》。这两种谱录是专门介绍端砚和歙砚的，都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当地的地理环境，砚石的开发、制造记述详细。特别是对坑脉、品种的记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现今我们可以知道的宋代的很多歙砚的品种，最早都是见于《歙州砚谱》的。纸谱一类，则有如《笺纸谱》者，专门记述了宋代蜀地造纸业的情况。

综合来看，两宋由于历史较长、士人文化兴盛，谱录数量较多，元代则数量相对较少。此外古人创作时，题材内容也有偏好。谱录对象主要集中在“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其他文房用具很少提及，更不要说有专著介绍了。目前存世的宋元谱录，只有《文房图赞》和《续文房图赞》提及了除“四宝”外的其他用品。在“四宝”之中，差别也不小。存世的宋元谱录，基本是介绍砚和墨的，介绍纸的只有费著的《笺纸谱》和鲜于枢的《纸笺谱》两种，篇幅都很小。关于毛笔的则没有一部。宋人在撰写谱录的时候，由于写作的态度不同，其书的详略、优劣差异很大。如米芾的《砚史》，由于作者是一代书法大家，对砚台使用、鉴赏，别有心得。故而其书记述翔实，并能结合自身经验，纠正前人错误观点。而高似孙的《砚笺》，由于作者多转抄前人之作，本身创作时亦似是作为笔记杂录，未